

玄妙神奇中的豪情志气与闲情阴郁里的春花秋雨

——中国四川现代乡土文学地域书写中的巴蜀文化识别*

[中國] 邱 艳** · [中國] 涂 鸿***

目 录

- 一、巴蜀文化的含义与对巴蜀文化的体认
- 二、“龙门阵”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故事性叙事
- 三、“鸦片”和“茶馆”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表意特征
- 四、方志意识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地域指认

地域文化包括某个地区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环境，从民间流传的习俗到精英思想的影响，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无论对本地域的民众，还是对生长于斯或者曾经生长于斯的乡土文学作家，都有着深刻而长久的影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乡土文学，可以探索到事物的根源，更深入而全面地了解 and 认识作家和作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乡土文学体现出来的，乡土文学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代四川乡土文学是在丰厚的巴蜀文化的土壤中孕育产生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李劫人、沙汀、艾芜、周文、罗淑、巴金为代表的巴蜀乡土文学作家开始登上文坛，取得了成功。在他们的小说中，带有明显的带巴蜀文化特色的风格。巴蜀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受到巴蜀文化浸润的巴蜀乡土文学

* 水原大学 中文系 教授

** 四川南充(637002)，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师。qiuyan430@yahoo.com.cn

*** 四川成都(610041)，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tuhongk@yahoo.com.cn

作家将之表现在具体创作中，使四川乡土文学呈现出了独特的巴蜀风格。

在五四以后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四川作家群算得上是对乡土题材最为钟情的一批，他们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专注于对故土乡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描摹。李劫人之于雄伟、凝重的成都，沙汀之于阴郁、沉重的川西北山区，周文之于残酷、凄厉的川康一隅，罗淑之于初民色彩的沱江上游，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巴蜀盆地的闭塞和宗法制下自成一体的农村乡镇的不同风俗。在四川乡土文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军阀、袍哥、地方官僚等强势人物，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所进行的力量的比拼、心智的较量和过度的享乐和放纵，显示的是对生命的挥霍和张扬。四川乡土文学世界中这种负面生命力的表现，正是源于巴蜀那种盆地王国中自大、张扬、放纵、享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群众基础。同时，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阻隔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和渗入，也使川人较少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形成了川地百姓闭塞和偏狭的心理形态，原始的蛮夷风俗得以保留。再者，由于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独立精神，保留了自由不羁的天性。这种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四川作家的性情、爱好，而且生动地表现于他们文学创作中，四川乡土文学世界中蜀人的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都能在这种地域文化中找到渊源。

一、巴蜀文化的含义与对巴蜀文化的体认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四川古称巴蜀，四川文化的研究一般都称为巴蜀文化的研究。巴蜀文化有两种含义，狭义是指秦统一巴蜀之前还称为巴蜀时期的文化，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¹⁾有学者认

为：“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²⁾所以，现在一般所说的巴蜀文化，就是指的上述广义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孕育于四川盆地的巴蜀山水之中，盆地的地形是封闭的，这是大自然的地理特点。倘若巴蜀先民囿于盆地的空间，脚不出盆，眼不出川，巴蜀文化就将是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就必然是一种落后的、毫无生气的文化。可是，这里的先民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封闭在盆地之中，为了扩大生存与发展空间，他们远在几千年以前就用执著的精神，开辟了一条条穿越盆地周边山地险阻的通道，与外界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不断吸收外地的先进文化，在汇纳百川的基础上，再加以发展创新。正是因为如此，巴蜀文化才可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辉。所以，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兼容。文化载体是人，特别在信息传递主要是由人来进行的古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外地文化的大量传入，巴蜀文化的汇纳百川，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几千年来多次的、大量的移民入川，是巴蜀先民在族源和血统关系上的大融合。本来，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但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西南地区的区域文化由巴、蜀两部分组成，其地域东起“巫诞”、“北与秦分”、南接南中，西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包括今天四川省的全部和鄂西、滇北、汉中等相邻地带。由于文化现状和地缘位置的邻接，巴蜀文化历来被视为一体，甚至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固定语词。但事实上，巴、蜀文化的源流和性质是迥然不同的。《华阳国志》在叙述早期的巴蜀地区的文化特征时，巴地与蜀地就有明显的不同。

所谓“巴文化”，是古代巴族建立的文化传统。巴人的生活地域集中在今川东丘陵地带，尤以嘉陵江流域的重庆（旧称巴县）和长江三峡地区为文化中心。丰富的水资源使巴人成为一个水上民族，以渔猎为生，以弓鱼为图腾。于

1) 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年月版P3

2) 谭洛非《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建议》，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5）

是，巴文化中更多地注入了清秀明快的“水”性，具有了一种疏阔流动的品格。由于瑰奇绚美的生存环境，巴人得山水之滋养，成为一个乐观开放、能歌善舞的民族。《楚辞》中记载的“下里巴人”，就是巴人用于合唱的上古民歌；而《风俗通》中记载的“巴渝舞”，则是巴人聚族狂欢时的集体乐歌。浪漫的巴人甚至在临阵杀敌时依然纵情歌舞，《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的说法。同时，长期的迁徙又使巴人具有了一种漂泊性。据记载，巴人始祖本来生存在湖北荆山地区，因楚国的威逼溯江而上，逐渐进入三峡地区，最后才定居在渝中（重庆）、巫涎（指巫峡）等地；巴人的一支还曾进入陕西，与当地氐人混居，因此有的学者又称巴人为“巴氏”。这种流动性的民族历史使巴人形成了不畏艰险、自由开放的性格，成为大一统汉文化圈外峡崖川谷中的一支浪漫精灵。因此，开放心态、艺术品格和浪漫气质就成为巴文化的主要特征，流传在古老的四川乡土中。

与巴文化的“水性”相对，蜀文化则具有更多的“山性”和“土性”。这个文化传统是由上古蜀人建立的，其地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眉番”。即今川西山地和成都平原地区。这里“沃野千里”，“人富粟多”，很早就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化。据传，西周时代的蜀王杜宇就曾“教民务农”，秦代又有李冰为蜀守，修筑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蜀文化是一个极为早熟的农耕文化，发达的农耕使蜀人染上恋土重迁的习性，不像巴文化那样富于流动性和变化性。同时四面重山叠障，中间为盆地的地理环境，使这里迁闭滞塞，长期孤立保守，文化交流成为畏途。于是，因循保守、隐忍坚毅、亦庄亦谐，重现实、轻幻想，就成为蜀文化的集中表征，活跃在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中。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基本看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大致差异。由于地缘邻近，文化互渗，巴蜀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区域文化共同体。青铜时代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从商代就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引进，二者形成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相近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进一步融合，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因此，近现代四川区域文化中既有蜀文化的遗风，也有巴文化的精魄。每

一个四川作家，无论其故乡是川东巴人故地，还是川西蜀国故里，都同时禀承着巴、蜀两种性质的乡土文化泉源，并可根据个人主观气质和生活履历的不同，进行自由选择。

从古至今，巴蜀文化都以其显著而独特的内涵和特点闻名于世。夏商时代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神权文明，西周至春秋战国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礼乐文明。战国末叶秦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逐步转型，成为秦后来是汉文化的一支重要地域亚文化，同时又给秦汉文化以积极影响。汉魏之际，巴蜀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天师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形成巴蜀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朝时，巴蜀地区的民族文化十分丰富，对巴蜀文化注入了新内容。隋唐五代，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全国大批文化名人入蜀，使巴蜀成为唐代全国文学最繁荣的地区，巴蜀的经济文化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巴蜀佛教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宋代经济高度繁荣，文化高度发达，文学、史学、哲学名家辈出，经济上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论在中国经济史还是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元代四川遭蒙古蹂躏，急剧衰落，明代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清初大批移民前来四川，开创了巴蜀文化的新阶段。近代四川文化丰富多彩，文史哲名家颇多，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³⁾

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占据过重要地位，尤其在长江上游开发史和西部经济文化发展史中影响十分深刻而巨大，堪称长江上游和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并具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一直影响到今天，长盛而不衰。

二、“龙门阵”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故事性叙事

四川现代乡土文学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无论是写成都还是写川西坝子、沱

3) 林军、张瑞涵：《巴蜀文化》，时事出版社 2008年01月版 P106

江流域、川康边境，都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讲究故事开头结尾的生动，讲究细节的典型与真实。正因为如此，在巴蜀的乡土文学世界中，演绎着一个个生动曲折、扣人心弦又朴实自然的故事。巴蜀民间自古就有讲故事、“摆龙门阵”的习俗。龙门阵最初是古代战争中摆的一个阵法的名称，据说由唐朝薛仁贵所创。现在所说的摆龙门阵一般是指聊天、闲谈的意思，主要在四川、重庆一带常用话语。也是这个区域人们生活的一大特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从屋檐下、院落中，到茶馆里、饭桌上，无论何时何地，巴蜀男女老少都“好聚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四川作家群，耳濡目染，不经意间就养成了善于讲故事、“摆龙门阵”的意识和习惯，他们在小说中对于故事的偏爱，就是这种“龙门阵”意识的自然流露。林文询在其著作《成都人》中如是评说龙门阵，称其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无论内容题材多么繁杂杂乱，“龙门阵”的中心是故事，只有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方能令听者欲罢不能，所以，讲究情节也就成了四川作家叙事结构的中心。如艾芜的《南行记》里面描述了许多底层人的生活，他们从事强盗、偷马贼、私烟贩子、赶马人、轿夫、窃贼等劫掠偷抢的勾当，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情节编织，使这些人物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心里。另外，既然是“阵”，自然是说者听者虽有主次之别却是共同参与，形成一种互联互动的形式，或者一人主讲，其他人插话补充，或者多人聊天，集体编排。不管采取哪种形式，肯定有较为集中的主题，多个人的自由散谈，也决定了话题的自由、旁逸，有时甚至会出现对旁逸部分刻意关注的情况。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多个人围绕着那幺吵吵之子被抓“壮丁”问题展开的谈论、争吵，就直如众人摆了一场“龙门阵”。再如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在小说正常的叙事过程中，陡地撇开主要人物、主要情节于不顾，却仔细地描绘起回天镇赶场的盛况来：琳琅满目的货物，云集蜂拥的商贩，熙来攘往的人群。在写到

生猪市场时，竟插入了大段关于川猪的介绍，从猪的形体、重量，到饲料、喂养，到猪肉的做法、吃法、口感，直到猪圈的修建、防病措施，应有尽有，精细备至。

四川作家对“摆龙门阵”传统既有继承，更有超越。“龙门阵”故事的特点是曲折生动，但它毕竟只是适合普通百姓口味而产生、流传的，其故事虽然讲究情节的生动曲折，但讲故事的方式终究还是老套了些。对此，四川作家在从民间文化的“摆龙门阵”中吸取叙事营养的同时，对各自乡土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创新。沙汀的开放式结尾和拦腰切入式开头，李劫人大河小说系列的宏阔构架等，都是对传统巴蜀民间叙事的超越。

三、“鸦片”和“茶馆”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表意特征

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茶馆”和“鸦片”是两个有代表性的意象，它们是四川民众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的一个缩影。

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茶馆，在各色人等麇集的茶馆，演绎着一个个反映了巴蜀世态人情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展示着四川独具特色的生存景观。坐茶馆是川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馆文化，是巴蜀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潜移默化中熏染、造就着川人的性情、思维和习惯。“各人按照老规矩一早起床，于是一路扣着纽扣上茶馆去。等到卖豆芽的来了，就抓几个钱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撮着。吃过早饭，又上茶馆，而且说着照例的话：‘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他们多是懂一点牌经的，不是参加赌局，便是站在牌客后面给当‘背光’，发挥着参谋的作用，简直比当事人还热心”（沙汀《某镇纪事》）。这种在茶馆消磨时光、打发日子的小镇生活模式，是凝滞的、沉闷的，在这种落后、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长久积淀形成的国民心态，就如同壶中的茶锈，天长日久，越积越厚，也越难以去除。如果说老舍笔下的北京茶馆培养着北方市民那种冲淡、诙谐的气质的话，那么沙

汀笔下四川小镇的茶馆则充满了四川民众愚昧麻木、自我消耗的味道。与“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越人相较，川人更是在享受中淹没了人生应有的文化品味与精神境界。“日斜的午后，或者上小吴轩去泡一碗清茶，凭栏细数数城里人家的烟灶，或者在冷红阁上，开开它朝西一带的明窗，静静儿的守着夕阳的蜿晚西沉……”这样的品茶境界和文化意境在四川文学中是难以觅到的、较之北方人的素朴和江南人的文化品味，四川的茶民缺少精神追求，也没有境界和浪漫，只有口腹的满足和麻醉。

鸦片，也是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一个关乎生命的有代表性的意象。鸦片在四川的普及程度和吸食严重程度令人无法想象。清末，在四川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袍哥、土匪及一般普通百姓，都离不开烟灯烟枪。鸦片对于巴蜀民众的腐化程度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政界因之而明争暗斗。周文在他的《第三生命》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军队中，“大家都抽鸦片烟。操场是很少上的，因为排长抽，连长抽，营长也抽”，结果“抽来抽去，一个个都抽得像庙子里的小鬼似的，皮子吸进去，骨头吸出来，如果脱下军服，让他们站在太阳光下，你可以看见一堆堆怕人的骷髅”。在军营里，鸦片甚至成为通行的“货币”，可以用来发薪、下赌、嘉奖，以至于那里的士兵都是手持双枪(步枪、烟枪)的军人。“每一宿营，饭有没有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不管，走进了破庙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枪，取出烟枪，躺下去，对着烟灯的豆大火光都就‘瞄准’起来了。在烟雾沉沉中，你可以看见万盏明灯，像放河灯似的，大家在‘开火’了”。即便在紧张的战斗时刻，也会“趁着这边的炮兵阵地正在轰隆轰隆一炮一炮地向敌人射击的时候，真是好像替大家掩护似的，让一部分人开着枪，其他一部分人就退到稍后方的几步，躺在麦田旁边，几个换替着挡风，把灯燃好就抽了起来。抽好了，又上去调其他一部分人来换班”。因为鸦片瘾，军队作战如同儿戏，人生也因为对鸦片的狂热嗜好而失去了它应有的严肃性，生命价值也因此贬值。

吸食鸦片是耽于享受的巴蜀民众的一大消遣，不仅与坐茶馆一样消磨着时光，内耗着精神，而且吞噬着体力，它实实在在地在大规模程度上铸造着愚昧而虚弱的国民。李劫人的《好人家》中的赵幺粮户有着三十年吸食鸦片的老

瘾，家里最多的是鸦片烟，由于担心“生坭吃完了，不好买”，便“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拔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坭，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结果，他的收房丫头春梅“由于服侍老头子，昼夜烧烟，也吃了一副大瘾”，他的两个儿子都“吃了一副大瘾”，两个儿媳妇“也学会了烧两口来消遣”。一家人就在烟雾氤氲中过着“简直与儒家的‘道’一样，‘天不变’，‘道’亦是不变的”凝滞麻木的生活。在沙汀的《淘金记》中，那些破落户、袍哥和痞子之流更愿意去烟馆“抽荤烟”，如龙哥、白酱丹、彭胖就经常光顾下场口范大娘家，这家的“床铺上摆着一副丑陋的烧烟家具。灯，是用膏药钉补过的，一张草纸权且代表套盘。但这并未减低大家的兴趣，因为彼此的目的原不在烟。那个满脸是粉、上唇有着一颗黑痣的游娼正在裹烟，一面应付着客人的调笑”。当烟瘾上来后，那吸食的做法也是各有奥妙。何寡妇“满足嗜好，是有一种自己的派头的。一例采用清水漂烟不说，吸的时候，还把泡子裹得又紧又小，就像羊子粪样。因为这样既不败气，又不容易让烟瘾自由发展下去、扩大下去”。这是比较讲究、文雅、有节制的抽法。而周文《父子之间》所描写的荀福全那种上下翻滚、上天入地的吸烟方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仅仅用嘴抽还不顶用，须得辅以身体的翻滚动作。可沉醉于神仙般腾云驾雾的鸦片世界中的荀福全，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痞子。在闭塞的巴蜀盆地，鸦片就是其乡民腐化堕落、自我消耗的一大罪魁。

四、方志意识与现代四川乡土文学的地域指认

记载一个地方的历史、现实以及种种地理、风俗等为方志。记录某个区域内综合情况的地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总体上看，四川现代乡土文学呈现出一种共有的客观、冷静甚至冷峻以至冷酷的写作姿态，与其他区域作家如鲁迅、王统照、萧军等将写实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方式相比，四川作家大都将激烈的情绪抑制、凝缩在其写实性的“本色”呈现中。无论是沙汀、艾芜，还

是李劫人，客观、冷静的叙事是他们较为一贯的艺术追求。

沙汀小说的沉郁、冷峻自不必说，无论是其讽刺语言的含蓄深沉，还是其情节结构的简洁质朴，都透着极强的写实性。他极少直接表露自己的褒贬之意、好恶之情，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黑暗的暴露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言行来实现的，作家笔下的代理县长、联保主任等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一类喜剧人物都有其穷形尽相的“表演”。这位四川乡土的精魂，在真实、客观、冷峻的描摹、叙述中展示着巴蜀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如《在祠堂里》写连长太太被军官们装进棺材的场面：“堂屋里的灯依旧燃着，正中摆着一口白木棺材，棺材附近站着两三个兵士，显出一种张眉张眼的惊惶神气。几个军官忽然把连长太太从卧室中拖了出来；她的嘴是用手巾堵塞住的，他们十分迅速地把她塞进棺材里去了。”⁴⁾一盏洋灯，一口棺材，两三个兵士，几个军官，嘴里堵着手巾的连长太太被迅速地“拖”出卧室“塞”进棺材，没有声音，没有打斗，沙汀只是客观、冷静地描述了一个简单、真切的画面，却令人毛骨悚然。连长太太被钉进棺材后，作者又写道：“夜很深，四近没有一点声息。锤子敲在棺材盖上的声音，恰如敲在木桶上一样。而在远处，突地响起了一阵巫师清脆的‘司刀’声，接着便是一阵悠长而又凄厉的呼唤。‘……三魂七魄回来没有呵！……’狗嚎叫着。……”凄清的氛围、生命的扼杀、连长的残忍、看客的愚昧与冷酷就在这看似平实的描摹中显现无遗。

与沙汀的简洁、利落不同，李劫人用自然主义的细腻写实手法，展现着一个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四川。如他的长篇《死水微澜》，作家对四川历史风俗的了然如指掌，他以成都城外一乡镇为主要背景，细腻而真实地表现了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

巴蜀长久厚重的方志文化，对于四川子民来说，就是最好的乡土教材，先贤的事迹文章，自然的青山秀水，身边的人事风物，亲切自然，为人所乐于接受。作为巴蜀文化精英的四川作家群，自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故乡真实自然的风物习俗和人们的生存命运，表现在现代四川乡土文学中就是对故乡风物人情

4) 《沙汀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07月版 P119

的“本色化”的艺术呈现。本色化是李劫人、沙汀、艾芜等四川作家一贯的风格，他们无不在用着富裕、冷峻的笔法表现着自己眼中熟悉的四川地区的独异色彩。

总之，李劫人、沙汀、周文、艾芜、罗淑等这些眷恋着也以批判的眼光谛视着自己乡土的四川乡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选材特色和表现方式观照着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完成着现代四川乡土小说的地域指认。他们既颂扬着巴蜀子民鲜活的生命意识，也揶揄、批判着他们的耽于享乐、争斗内耗，及其在落后、封闭的文化传统支配下“涸水沱”式生命形态..这种负面生命力的蓬勃张扬，不仅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桎梏，也吞噬了个体自我发展的意志和能力，使巴蜀社会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不同的生命形态，也孕育不同的乡土意识和状貌各异的地域文学。由于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以及生产力的落后，华夏大地各区域之间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致使华夏文化呈多元状态。巴蜀文化，就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域条件所形成并不断沉积的巴蜀文化，强烈地影响和铸造着蜀人的思想意识和性格行为方式，将自身的模式特征，深深地烙刻在本文化圈所有的人的生存实践中。被巴蜀文化所影响铸造的本土作家，在其人生实践和艺术创造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极为清醒自觉的对乡土文化的皈依，作品中渗透出强烈的巴蜀文化因子。巴蜀文化因子在先贤创作的范式导引、蜀中社会生活的形象化馈赠、地域风习民俗和“巴蜀式”的心理思维等方面都对四川本土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川作家反叛、张扬、追求自由、注重个性的特点，正是地处西僻、远离正统文化、道理理性负轻的巴蜀自由、反叛的文化传统使然。巴蜀文化精神不仅从方方面面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塑造，也对四川现代乡土文学文本施加着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是文学文本内容的母性渊源，也对文学作品形式和表现手法影响巨大，作品中处处充溢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

细细品读现代四川乡土文学，呈现出来的多是巴蜀民间文化的原生态。强

悍的民风，山民的勇敢乐观、豪爽开放、吃苦耐劳的性格给四川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这些性格特点在他们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种精神在一切都平常化的今天，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
- 林军、张瑞涵：《巴蜀文化》，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 李士文：《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黄曼君：《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 《沙汀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沙汀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四川巴蜀书社2003年版。
- 张瑞英：《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表现艺术》，载《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1月。
- 张瑞英：《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载《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3月。
- 林向：《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载《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
- 谭洛非：《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建议》，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10月

<Abstract>

The Lofty and Pride in Mysteries and Miracles and the Romantic in Leisureliness
and Gloom

— Identification of Bashu culture in the regional writing of modern Sichuan local literature
in China

Qiu Yan · Tu Hong

Bashu culture is a typical regional culture deeply rooted in the Ba Mountains & Shu Rivers. Represented by Shading, Aiwu, Li Jieren, Zhouwen, Luoshu, and Bajin, the Bashu culture influenced Bashu local literature writers showed intense and sober embracing to local cultures in their life and artistic creating, permeating distinct color of Bashu culture, like story-featured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region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objective realistic satire art, and vivid and expressive “Sichuan flavor” dialect, which all manifes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Bashu culture, and interpret the unique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of Bashu culture.

Key Words : modern Sichuan, local literature, culture identification

투 고 일 : 2011. 9. 10. / 심 사 일 : 2011. 9. 26. ~ 2011.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10. 20.